

复旦新闻系创办者谢六逸的历史剪影

读史老张

今年11月2日,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华诞。在复旦新闻学院办公楼二楼墙上,悬挂着历届新闻系主任(院长)的照片,排在第一位的是新闻系创办者谢六逸先生。谢六逸(1898-1945),贵州贵阳人,著名作家、翻译家和新闻编辑家。1926年2月,他到复旦中国文学科任教,同时建议刘大白主任设立新闻系。9月,中国文学科内设新闻组,聘他为主任。1929年,新闻系正式创办,他任首届系主任。复旦新闻系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新闻教育机构之一,迄今已整整90周年。

一个让人猜不出年龄的人

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,谢六逸的名字已经陌生,形象有点模糊。在他短暂的一生中,留下的照片也不多。墙上悬挂的一张,谢六逸穿浅色西装,系斜纹领带,是他难得的肖像照。这张肖像照究竟摄于何时,不得而知。看上去,肖像照上的谢六逸三四十岁的样子,但用茅盾先生的话来说,你很难用年龄去判断他,“三十以前的我,不知高低,喜欢发议论,喜欢和人争辩,六逸却是沉默寡言,被询问时亦不肯多说话,我们都说他‘有涵养’,猜想他岁数比我们大些——后来才知道他比我小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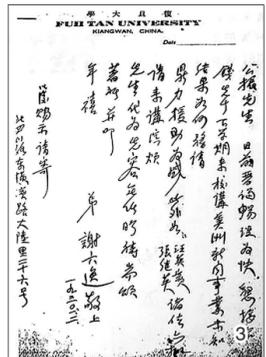
谢六逸早年留学日本,192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,是日本文学权威,曾写过三部日本文学史论著。赵景深先生记得,有一次去谢六逸家,“他正埋头写作《日本文学史》,案头堆着很高的一堆日文版日本古代文学作品,花花绿绿的书籍,约莫有四五十种,大都是硬面的”。(赵景深《文人剪影·谢六逸》)郑振铎先生所著的《四卷《文学大纲》》,其中日本文学部分就是谢六逸写的。郑振铎说,谢六逸自己“从来不曾向人提起过”。

谢六逸在文学上的造诣,早已蜚声海外。1926年1月,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,谢六逸是他最想见的三位中国新文学代表人物之一(另两位是田汉和郭沫若)。谷崎这样描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:“谢六逸君来了。穿一套薄薄的,似是春秋季西服般的浅色的西装,上衣的里面露出了羊毛衫。这是一位脸颊丰满、大方稳重、温文尔雅的胖胖的绅士。”这个描述,与肖像照上的谢六逸形象非常接近。有趣的是,与茅盾一样,面对眼前这位中国作家,谷崎也猜不出他的年龄,“从他稳重得体的举止和有些稀少的头发来看,使人感到已有相当的年纪了,但他说曾是精二(谢六逸的日本老师——引者注)的学生,一定还很年轻吧”。(谷崎润一郎《上海游记》)

温和慈祥的“胖子”

谢六逸的个人肖像照很少,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照片,很大部分是他与别人的合影——即便是合影,面世的也不多。1935年,谢六逸曾与时任复旦中文系教授的赵景深等人合过影,赵景深记得照片中的谢六逸,“他那胖胖的脸,嘴巴似乎要笑而忍住了的并成一线,幽默的瞪着眼睛,真像是和蔼的弥勒”。这张合影,不知今在何方?

前些日子,我去复旦档案馆和校史馆,在几张复旦师生的合影中找到了谢六逸。因年代久远,这些合影并不清晰,但我却能一眼认出他来——因为,谢六逸是个“胖子”。当年,“胖子”



并不是贬称。曹聚仁先生曾以《三个胖子的剪影》为题,写过赵景深、李青崖和谢六逸三位复旦同事的“老友记”。赵景深本人也说过,“从前《文学周报》的八位编辑,四瘦四胖;四瘦之中郑振铎和徐调孚都在内,四胖之中有耿济之和李青崖,还有两位就是谢六逸和我。”徐调孚先生则记得,对于谢六逸,“朋友们有直呼他‘胖子’的,他总是答应”。

在朋友们眼中,谢六逸脾气好、谦逊、低调,“胖子的性格,以有耐心、富涵养者为多……谢先生正是一个胖子的典型人物,有谁见过他‘怒发冲冠’或‘剑拔弩张’的状态吗?他平日是静默寡言,开起口来,又老是温和慈祥,他从不曾有过疾言厉色”。(徐调孚《再忆谢六逸先生》)“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,披肝沥胆,无所不谈。但遇到了生疏的人,他便缄口不发一言。”(郑振铎《忆六逸先生》)谢六逸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时,茅盾、郑振铎和徐调孚等都喜欢跟他开玩笑,“我们见面的机会多,我们给他上了个尊号:‘贵州督军’,尊号何必称‘督军’,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的,总该可以谅解;至于‘督军’而必曰‘贵州’,一则因为他是贵州人,二则我们认为六逸倘回家乡去,还不是数一数二的人物,至少该当个把督军”。(茅盾《忆六逸兄》)对于这些玩笑,谢六逸大多“随了大众而欢笑,绝不提出否认”。(徐调孚《再忆谢六逸先生》)

“和颜悦色”的另一面

谢六逸到复旦任教后,深受学生爱戴。舒宗侨先生回忆,1932年初,他到复旦新闻系读书,谢六逸主持人口试,“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敦厚谦和……”学生们一致认为,谢先生“是一个标准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悔的



- 1.谢六逸(后排左九)与复旦师生合影(复旦校史馆藏)
- 2.谢六逸肖像照(复旦档案馆)
- 3.谢六逸1930年致戈公振信
- 4.1938年8月,复旦新闻系学生在夏坝欢送谢六逸主任离任。穿长衫者为谢六逸(复旦档案馆)



与“中山装”(穿中山装者)的对话,令我印象深刻。读完随笔,再仔细端详几张谢六逸的照片,我忽然发现一个细节:他似乎偏爱穿长衫。在与复旦师生的合影中,谢六逸几乎总是一袭长衫,风度不凡。

对于自己的教授角色,谢六逸非常满意。他先后开设过东西方文学史、小说概论、文学纲要、日本新闻事业、实用新闻学、新闻学概论和通讯练习等课程,他创设的新闻系课程及设备标准,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大学新闻系的准绳。1935年1月,他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刊登了“这八九年来,我的生活,就是所谓‘教授’,如果成了‘做一行厌一行’的心理,这种中国特有的大学教授生活,是颇难持续到如此长久的……如是者八九年,我还是跑我的路。我不想改行做医生或者做律师,我有一股傻劲儿,就是想多看一点书。”

谢六逸热爱复旦,下课后总喜欢在校内外溜达。他曾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复旦周边景色:“除了假日以外,我每天总得经过江湾路和翔殷路(今邯郸路)一带。对于这一条平坦的大路,我可以算是一个‘通’。我亲眼看见田间的稻田里,建起一座一座的洋楼。在田里吃草的小羊,穿红绿衣裤的乡间小孩,撒棉花的村妇,一天一天的不知他们的去向。路旁的草,依然由绿变黄,由黄变枯,再由枯变成绿色。”有一次上“通讯练习”课,他叫学生们先步行到江湾路上走一走,回来写一篇通讯《途中所见》,以锻炼观察能力和写作技巧。谢六逸自己也多次从复旦出发,去江湾“新市区”(今江湾五角场一带)考察。有一次,他去察看虬江码头后,沿着五权路(今民星路)折返,特地走到市政府大厦(位于今上海体育学院内),“瞻拜那一所雕栏玉砌的宫殿”。

在复旦任教时,谢六逸还有一段插曲:他曾当过由“亚洲球王”李惠堂执教的复旦足球队守门员。他的学生们记得,有一次,复旦新闻系队与《时事新报》队比赛,“谢六逸镇定自若,

穿长衫的守门员

谢六逸的《三等车——A Sketch》,是一篇揭露国民党当局腐败的著名随笔,文中的“夏布衫”(穿白夏布长衫者)是一个重要角色,他

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

在这期间,钱学森非常痛苦,他带着惨痛的心灵创伤,泛舟在科学的苦海,他尽力从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和数学的教学工作,希望借着紧张的工作,忘却所遭受的困厄。

这一时期,钱学森研究所遇到的困难超过以往任何时候,他的研究工作经常受到移民局的监视和随时的调查谈话,甚至电话都要受到窃听。虽然钱学森的心理遭受了难以言状的压力,身体也因几次听证会的煎熬受到极大的摧残,但都没有磨灭钱学森的创新精神和对科学研究的兴趣。除了在此期间发表了很多的论文外,钱学森还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两大领域。

钱学森出狱后,仍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,继续承担学院的教学任务,教学风格也依然保持一贯的严厉、认真,其中一位学生托马斯·K·考伊(Thomas K. Caughey)后来回忆说:“如果你对讨论的内容熟稔于心,他会尊重你;如果你对讨论的内容一知半解或者根本不理解,他会把你批得体无完肤。”

在研究方面,由于他不能从事涉密研究工作,于是将研究重点转到控制论方面。他的《工程控制论》出版后,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后来,那本书还被翻译成俄文、德文、中文以及捷克文等。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写作初衷,著者认为,这既是钱学森着眼航天技术发展方向以及突破重要技术问题的需要,同时也是钱学森不服输、不认输个性的充分彰显。



羁绊与归来

钱学森的回国历程

张现民 著

1954年,钱学森在困难时期写成的《工程控制论》,在科学界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《科学美国人》杂志希望就钱学森的科学研究作专题报道,该杂志编辑杰奎斯·卡特(Jaques Cattell)也希望将钱学森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团体。在卡特将这个想法告诉钱学森后,却遭到了钱学森的明确拒绝,钱学森希望将自己的名字从杂志中删除。6月25日,杰奎斯·卡特再次致函钱学森,询问为什么强烈建议将名字从杂志中删除。

6月30日,钱学森复函杰奎斯·卡特。信中称:“(一)虽然我对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,但是如果把美国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,我难有同感。换句话说,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的一员,我感到很羞辱。(二)事实上,我并不是美国科学家,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。目前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命令将我暂时滞留在这个国家而已。”

1954年8月4日,美国科学促进会业务主管汉斯·努斯鲍姆(Hans Nussbaum)致函钱学森,告知他人选新一年度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,信中说:“根据我们的记录,我们还没有收到你1954年度的会费。请你

把附件中的卡片和汇款一同寄过来。收到这些材料后,我们将把会员证书邮寄给你。”8月13日,钱学森复函汉斯·努斯鲍姆,表达了与写给《科学美国人》编辑信件内容基本一致的态度。

钱学森的行军审查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,还经过了很多部门的审查。从这些部门提交的审查报告以及司法部所掌握的情况看,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问题。虽然有些文件上还有涉密字样,但从查封的时候看,这些资料绝大部分都已解密或者进行了降密处理,只有少数资料为内部资料,更有个别资料当时仍为“绝密”资料。被扣资料在经过近一年的审查后,钱学森索回那些被扣押的文件。早在1951年4月,在签署同意将部分文件返还军部的时候,他就提出了索回这些资料的愿望。

钱学森索回文件的要求,无论是美国海关还是司法部,他们都迟迟没有答复。即使到了1953年9月,还有大批资料仍然被封存在洛杉矶海关。

经过数年的钱学森被扣行李的审查以及根据数十次听证会的意见,1954年4月,美国政府有关机构就此问题协商一致,

处险不惊,以其准确的判断、敏捷的反应和稳健的动作,多次扑出了势在必进的险球,博得了球迷们阵阵喝彩。他那娴熟的技术和幽默滑稽的神态,逗得观众捧腹大笑不止”。(苏锦元《足球“门神”谢六逸》)还有一次是1935年校庆30周年当天,“谢先生兴致勃勃……穿了长衫,当守门员,胖胖的个子,奔跑跑西,十分积极,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”。(章玉梅《复旦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谢六逸》)在学生的笔下,谢六逸的“门神”形象栩栩如生——他居然“穿了长衫”还能“奔东跑西”、“处险不惊”,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守门员的所有想象!

最后的“金刚怒目”

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,复旦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西迁。1938年春,联合大学分家,复旦抵达重庆北碚。谢六逸也辗转入川,到北碚复旦任教。8月,谢六逸因病离开重庆,返回家乡贵阳,到入驻贵阳的大夏大学任文学院院长——从此,他告别了任职长达12年之久的复旦。

谢六逸离任前,复旦新闻系学生举行了欢送仪式。北碚夏坝江堤边,师生依依惜别,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这张照片,大致可以确定拍摄时间——时值8月,重庆地区气候炎热,男女学生都穿着短袖衬衫或短袖旗袍,唯有谢六逸与众不同:他依然穿着长衫,居中站立,显得卓尔不群,气场强大。

谢六逸到贵阳后,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。1939年2月,日机轰炸贵阳,谢六逸房屋被毁,他和家人被迫避居乡间。那时贵州物价飞涨,他生活窘迫,贫病交加,全家不得不以野菜和豆腐渣充饥。那几年,凡见过他的好友都发现,“胖子”谢六逸瘦了。萨空了先生评论道:“一个大胖子居然瘦了许多,这瘦完全说明了二年来他的遭遇。”1942年5月18日,叶圣陶先生路过贵阳,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:“饭罢至文通书局始晤六逸,此前消瘦多矣。”1944年,塞先艾先生到访谢家,见谢六逸“人比从前瘦了一大半,两眼深陷很没有神,说话有点微喘”。

复旦校友们也惦念着谢六逸。1939年秋冬,中文系毕业生凤子(封季壬)路过贵阳时,特地与舒宗侨一起去看望谢六逸。凤子记得,“他留我们吃了晚饭,谈到战时生活,看来他虽在家乡,而战争前途渺茫无期,生活不宽裕,心境似不佳,未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!”1941年,新闻系毕业生冯志翔专程去贵阳拜谒谢六逸,“他住在贵阳乡下,送我在田间走了一段路,谢先生显得苍老许多,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……”1945年8月8日,谢六逸溢然长逝,年仅47岁——这一天,离抗战胜利只差一个星期。

就在去世前几个月,谢六逸还有过一次“金刚怒目”:年初,四川军阀、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忽然心血来潮,发起“短衣运动”,反对民众穿长衫。他组织宪兵“剪衣队”,凡遇市民穿长衫者,一律剪短。这让爱穿长衫的谢六逸忍无可忍,他在报上发表《对于“短衣队”的意见》一文,批判这种愚昧行动。文章刊出后,杨森暴跳如雷:“我要看看枪杆子与笔杆子究竟哪个硬?”后来,他因忌惮于谢六逸的声望,只好取消了“剪衣”。谢六逸这次最后的抗争,让好友章锡琛先生十分感慨:“平常只看到他态度安详,沉默寡言,但到了愤怒填膺的时候,他真有奋不顾身的勇气。”

谢六逸去世时,口鼻流血,他究竟是死于心脏病,还是其他原因,一直是个历史之谜……

优秀党员、市级劳模为您服务 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三级资质 云安装潢 400-021-2956 特别推出新居装修 60m² 88m² 128m² 4.88万元 6.18万元 8.28万元

Table with 6 columns: 宝山/静安, 徐汇/闵行, 普陀/嘉定, 浦东/金桥, 杨浦/虹口/黄浦, 静安/长宁. Includes addresses and phone numbers.

解秋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: 金银首饰, 百货卖场, 休闲旅游, 儿童用品, 食品餐饮, 建材装潢, 体育健美, 超市促销, 家具厨卫, 家用电器, 婚纱摄影, 品牌人物, 酒类饮品, 医药保健, 教育出版. 电话: 021-22898552